

智通 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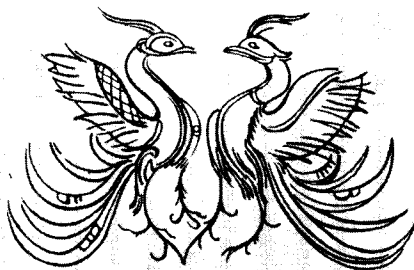
王利锁◎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智通 庄子

王利锁 著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通庄子 / 王利锁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 - 7 - 80195 - 718 - 4/B · 220

I. 智… II. 王… III. ①道家②庄子—研究 IV. B2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7178 号

智通庄子

-
- | | |
|------|--|
| 作 者 | 王利锁 著 |
| 责任编辑 | 姬登杰 责任校对 张新兵 |
| 出版发行 | 九州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
| 发行电话 | (010)68992190/2/3/5/6 |
| 网 址 | www. jiuzhoupress. com |
| 电子信箱 | jiuzhou@jiuzhoupress. com |
| 印 刷 | 北京北邮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 × 1000 毫米 16 开 |
| 印 张 | 14 |
| 字 数 | 190 千字 |
| 版 次 |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195 - 718 - 4/B · 220 |
| 定 价 | 22.00 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智通 庄子

王利锁，男，1964年8月生，河南伊川县人。198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2001年曾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先生作访问学者。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中国《诗经》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文化史研究。出版有《逍遥之祖》、《诗说中国五千年·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国古代应用文甄体赏鉴》等著作多部，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目 录

一、智海寻踪	(1)
1. 旷代奇才	(1)
2. 百家之冠	(4)
二、灵境探幽	(12)
1. 游心于物之初	(12)
2. 方今之世, 仅免刑焉	(22)
3. 通天下一气耳	(28)
4. 恢诡谲怪, 覆云屡生	(41)
三、深闳远肆	(54)
1. 庄学与荀学	(55)
2. 庄学与汉晋学术发展	(58)
3. 庄学与理学	(68)
四、慧通九境	(78)
1. 道教宗师	(79)
2. 禅宗心友	(86)
五、营魄抱一	(94)
1. 庄学与中医学	(94)
2. 和神导气	(97)
3. 为寿而已	(100)

六、世道人心	(104)
1. 曙光初现	(104)
2. 庄风大畅	(107)
3. 流思余韵	(114)
七、法天贵真	(122)
1. 会心处不必在远	(123)
2. 神契造化	(125)
八、蝶化文澜	(133)
1. 讥世醒眼	(134)
2. 灵鬼盘踞	(140)
3. 但开风气不为师	(149)
附录 《庄子》选译	(154)
逍遥游	(154)
齐物论	(156)
养生主	(162)
人间世	(164)
德充符	(166)
大宗师	(169)
应帝王	(176)
马蹄	(177)
胠篋	(178)
在宥	(181)
天地	(182)
天道	(183)
天运	(185)
刻意	(186)
缮性	(187)
秋水	(188)

至乐	(194)
达生	(196)
山木	(199)
田子方	(202)
知北游	(204)
庚桑楚	(209)
徐无鬼	(210)
则阳	(211)
外物	(213)
寓言	(215)
列御寇	(216)
天下	(217)

一、智海寻踪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恰是其奠基时期。在这个纷繁扰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峥嵘期，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文化巨人和巨著应运而生，他们或关注社会伦理的重塑，或体察世道人心，对社会理想发展蓝图进行规划设计，或重视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思考，或为治世提供自己宏博深邃的智慧，犹如灿烂的群星，照耀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塑造，在诸多方面，都起到了程度不同的作用和影响。这些巨人，堪称上古时代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这些巨著，正是上古时代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这为数众多的足以使后人引以为自豪的文化巨人与巨著中，庄子其人被论者赞为“一代奇才”（宋·高似孙《子畧》），《庄子》其书被誉为“百家之冠”（晋·郭象《庄子序》），对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地位不容忽视。

1. 旷代奇才

先秦时代绝大多数思想家的生平资料，在现存的历史典籍中保存甚少，尤其是道家人物，更是如此。因此，后人不可能对他们的生活历程和行踪事迹作比较完整的、系统的、具体的叙述。这就使得他们的生平事迹，在今天看来变得扑朔迷离。就庄子来说，现存唯一比较可靠的资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所附的仅有234个字的《庄子列传》。除此之外，虽然在《庄子》一书中有关庄子的记载有30则之多，但那些“事迹”大部分为寓言，不能作为了解庄子生平和文化性格的资料来使用；只有少数故事，与《史记》以及《庄子·天下篇》等所载庄子性格思想比较接近，学者们认为有比较大的可信性，至少可以说是透露出一些庄子生活的真实信息，可以作为了解庄子生平的参考。我们就根据《史记》和《庄子》中有关庄子的记述，对庄子生平和文化性格作一个简单的

介绍。

庄子，姓庄名周，是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约 20 里处，另一说是今安徽蒙城县）人，其生卒年月不可确考（近人有多种说法，大致都在公元前 375 年到前 275 年之间），活动的主要年代在齐宣王、梁惠王时期，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为同时代人，比楚国大诗人屈原稍早，相当于战国中期。他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庄子不仅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哲学大师、思想大师，而且也是我国文学艺术史上一个成就卓越的文学大师、语言大师。他阐发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发展了道家学说，使之成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流派——庄子学派。

庄子早年曾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后隐居不仕。楚王听说他很有才能，曾派使者带着厚礼去聘请他做国相，被他拒绝。他笑着对使者说：“您难道没有见过供祭祀用的牺牛吗？活着时人们对它精心喂养，给它佩上华丽的衣饰，但是当祭祀时，就要把它送入太庙杀死，充当祭品。这时它再想做个一般的牛，还能办得到吗？您还是赶快离开吧，不要玷污我。我宁肯在贫贱中生活，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我要一辈子不做官，来实现自己的志向。”（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他的“志向”就是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这点在后面介绍庄子的思想时还要谈到。

因为庄子不愿做官，甘居贫贱，所以他一生都是在穷困潦倒中度过的。他主要靠打草鞋和钓鱼为生，有时不得不向友人借贷；他穿粗布衣裳，有时还得打上几个补丁；他住在穷闾隘巷，有时竟饿得面黄肌瘦，精神疲惫不堪。尽管如此，他仍然鄙薄富贵，视之如腐鼠。他的好友惠施在梁国为相，一次他前去相会，有人在惠子面前挑拨说，庄子这次来梁国，是想要代替你做国相。于是惠子感到有些恐慌，在国内搜寻庄子，一直搜了三天三夜。庄子便去见他，并对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鹓雏，您听说过吗？鹓雏从南海出发，向北海飞翔，一路上不是高大的梧桐树它就不落在上面休息；不是纯洁的竹子的果实它就不吃；不是甘美的醴泉之水它就不喝。这时有只猫头鹰拣到一只腐烂的老鼠，鹓雏正好飞过，猫头鹰以为鹓雏要来抢夺它的腐鼠，仰起头来瞪着鹓雏叫喊：‘嚇！’现在您想用你的梁国来‘嚇’我吗？”（见《秋水》）在这个故事中，庄子以鹓雏自比，用猫头鹰来比惠施，从而使读者清楚地看到以惠施与庄子为代表的两种不同人物的迥然不同的心态。

大概是由于惠施的介绍，庄子在梁国会见了梁王。梁王看见他衣衫褴褛，便问他：“先生怎么这样疲困啊？”庄子回答说：“这是贫穷啊！而不是疲困。士人徒有理想且道德高尚，但却不能施展才能，这是疲困；衣破鞋烂，这是贫穷，而不是疲困，这就叫生不逢时啊！大王难道没有见过那些善于腾跃的猿猴吗？当它们在楠、梓、豫、樟等大树上时，攀枝缘条，自由自在，独霸一方，就是善射的羿和逢蒙，也对它无可奈何。但当它跌落在长满拓、棘、枳、枸等多刺的荆棘丛中时，就会小心谨慎、胆战心惊，不敢随便走动。这不是因为它的筋骨不再柔软灵便，而是因为处在困难的环境中，不能够施展它的才能啊！我现在处在昏君在位奸相弄权的时代，想不疲困，能办得到吗？殷末的比干被剖心，就是一个显明的例证啊！”（见《山木》）这个故事不仅说明了庄子的贫困不被人理解以及造成贫困的社会根源，还委婉地告诉人们，他不愿做官是害怕落得比干的下场。

庄子博览群书，学多识广，受老子思想影响较深，是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善于写作，长于辩论。他的好友惠施是当时名辩学派的著名人物，两人虽然生活态度和学术观点很不相同，经常辩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感情非常深厚。惠施死后，一次庄子经过惠施的坟墓，对跟从他的人说：“有个郢地的泥匠鼻尖上沾了一点白灰，像苍蝇的羽翼那么薄，让一位木匠替他削掉。木匠挥动斧子呼呼作响，泥匠一动不动地任凭他砍削。结果白灰削得干干净净，而鼻子一点也没受到伤害，泥匠还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宋元君听到这件事后，把木匠找来说：‘请你再给我试试。’木匠说：‘我过去曾经能砍，但是现在能让我砍的那个人死了很久了。’自从惠子死后，我也没有对手了，我没有能够谈论的对手了！”（见《徐无鬼》）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位讲友谊重感情的人。庄子不仅重感情，而且也是一个充满生活幽默感的人，他对人生之情有宏通深远的理解，生活中常常表现出谐谑的情调。如他与惠子在濠梁上观鱼，同惠子的那段对话，就鲜明地表现了他的睿智和幽默。

庄子虽然一生穷困，饥寒交迫，但他心情宁静，自得其乐，善于排解苦痛，并不追慕荣华富贵，善于以达观的态度对待各种事变，甚至对生死问题也是如此。比如，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去吊丧，看到他正两腿叉开坐在地上，敲着瓦盆唱歌呢。惠子责备他说：“和妻子相处一辈子，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年老身死，你不哭也就够了，还要敲着盆子歌唱，这

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说：“不是这样的。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么能不悲伤呢？但我又察觉到她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没有气。混杂在恍恍惚惚之间，变化而产生了气，气变化而成形体，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现在又变化而为死亡，这样变来变去，就好像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运行一样。人家将要静静安息在天地这所大房子里，我却跟着嗷嗷地哭，我认为这样就是不通达命运之理，所以停止了哀痛。”（见《至乐》）庄子对生死问题的这番妙论，在当时确实是超乎一般人之上的，认为生老病死，人生之常，客观之理，死是找到了最后的归宿。正因为如此，庄子是中国历史上主张薄葬的先驱者之一。庄子将要死的时候，他的学生想要厚葬他。庄子对他们说：“我用天地做棺槨，用日月作双璧，星辰作珠玑，万物作殉葬。我的葬礼还不够完备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多更好的呢？”学生们说：“我们害怕乌鸦老鹰吃了您啊！”庄子说：“露天葬让乌鸦老鹰吃，埋在地下让蝼蛄蚂蚁吃，从乌鸦老鹰嘴里抢过来送给蝼蛄蚂蚁，为什么要这样偏心呢？”（见《列御寇》）像庄子这样在死亡面前仍然能保持平静的心境，处之泰然的人，还有什么世俗的烦恼、人生的痛苦不能摆脱呢？那么，庄子为什么能达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这样高超的精神境界呢？这同下面我们将要重点谈到的他的崇尚自然、安命处顺的哲学思想有密切关系。

由以上简单的勾勒，我们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生活在社会底层，家境贫困，但又能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他对当时社会极度不满，不愿与统治者合作，宁肯甘守贫贱也终生不仕。他身处逆境，有着深刻的精神危机，对生命存在有深刻的体悟，又追求个性精神世界的绝对自由。他心胸高远旷达，富有幽默感和谐谑情调，博学多才，善于思考。他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素养又关注自己生命存在的知识分子。他的这种特殊的身世和文化性格，决定了他对人生的独特认知。他的宇宙自然观、社会观也同此密不可分。

2. 百家之冠

《庄子》一书，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原有52篇。这可称为古本《庄子》，大概是西汉末年刘向在校理古籍时编定的。到魏晋时代，玄学大兴，注《庄》者蜂起，在郭象之前，已有数十家（见《晋书·郭象

传》)。这些注本，有些是全注本，有些是选注本。据唐代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记载，他见到的全注本有司马彪的21卷本和孟氏的18卷本，均有52篇，保存了古本原貌。选注本主要有崔譔的10卷27篇本，向秀的20卷26篇（一作27篇，一作28篇）本，郭象的33卷33篇本，李颐的30卷30篇本。因为郭象的注释思想精深，为世人所重，唐以后成为社会上流传的通行本，其他注本读者渐少，遂至亡佚。所以，我们今天见到的《庄子》均为郭象的选定本。据宋人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序》称，《庄子》33篇，共65923字。而司马迁见到的本子则有“十余万言”，说明《庄子》在流传中是有过散佚的。

今本《庄子》33篇，主要由三类组成，即《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这种分类法也非古本所固有。有资料表明，汉时《庄子》有《内》、《外》篇之分（参看《经典释文·庄子音义·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句下引崔譔注），但未见有《杂篇》的记载。《内》、《外》、《杂》三分法，就现有资料看，应为晋代司马彪所首创，他注的《庄子》52篇，分为《内篇》7篇，《外篇》28篇，《杂篇》14篇，《解说》3篇。其中《解说》3篇，据后人考证，当是淮南王刘安解说庄子的著作，不应当划在《庄子》之内，所以原属《庄子》的原始文字实际上只有49篇。郭象的分类是在司马彪注本的基础上进行的，经过取舍，保留了原文33篇，其中《外篇》删去13篇，《杂篇》删去3篇。因为在郭象看来，原本《庄子》中有些文章，是“一曲之才，妄窜奇说”，非庄子所为，应当删去。这种认识在当时并非罕见，正像唐代陆德明所说：古本庄子，“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

《庄子》的《内篇》与《外》、《杂》篇在文章标题上有个明显的区别，《内篇》7篇的标题均为3个字，且都是以意命篇，标题都提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外》、《杂》则不然，标题均和文章内容无紧密关系，而是取开头一句中的两字或三字为之。这个区别在后世的学术公案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成为庄学研究家们判定文章真伪的一条重点标准，尽管他们结论有时是完全相反的。大要而言，这方面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主张《内篇》为庄子自著，《外》、《杂》非庄子所著的，乃庄子后学所为。如清人林云铭就说：“内七篇是有题目之文，为庄子手订者；外、杂篇各取篇首两字名篇，是无题之文，乃后人取庄子杂著而编著之者。然

则或曰外，或曰杂何也？当日订庄子之意，以文易晓，一意单行者，列之曰前而名外，以词意难解众意兼发者置之而后而名杂，故其错综无次如此。”（《庄子因·庄子总论》）第二，认为内篇非庄子所作的，而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外、杂篇才是庄子所作。此观点同上一观点正好相反。如今人任继愈在其《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就是这样认识的，其理由之一就是由文章从无题到有题的发展规律看，外、杂篇以开篇首句两字作题，保存古例；内篇为有题目之文，从时代上看，当晚于外、杂篇，所以不应是庄子所作。第三种观点认为应打破内、外、杂界限，以《逍遥游》、《齐物论》为标准来进行判定，凡符合此者即为庄子所作，其他则为后学所作。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即是如此认识的。我们认为，庄子思想的影响是以《庄子》书为基本前提的，所以，不妨将《庄子》作为庄子学派的代表资料来看待。

关于《庄子》33篇的辨伪，可溯源到北宋的大文学家苏轼。唐时人们一般认为《庄子》古本中有伪作，至于郭象注的33篇，则认为是真品，即都是庄子本人的作品。这种观点一直到苏轼时，才发生变化。他在《庄子祠堂记》这篇短文中，首次提出《盗跖》、《渔父》、《让王》、《说剑》4篇不是庄子所作。因为在苏轼看来，庄子对孔子是非常尊敬的，只不过表现形式特殊，是“阳挤而阴助之”。而“《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所以都是伪品。苏轼此论一出，影响极大，后人争相辨伪，历代不绝，且有增无减，所指伪作的篇数也愈来愈多，以至形成了一种传统观点，即认为除《内篇》7篇之外，《外》、《杂》篇均是伪品。当然，坚持《庄子》书中无伪作的观点的人也有，如明末谭元春就认为《庄子》一书应是庄子平生所著文章总集，既非一时之作，又不专主一家，所以既有“蔓衍纵深、峭栗华畅”之篇，也有“筋弩肉缓、气绵力薄”之作，但都是庄子本人所为，不当妄指某篇为伪。（《庄子南华真经》）不过这种观点过于褊狭，因而不被人们重视，影响很小。

这种辨伪显然存在一个问题，即所谓的真伪是指文章是否庄子本人所写而言，凡是认定是庄子所写的就是真品，凡是认为不是庄子所写的就是伪作。但是要确切判定哪些为庄子所作并非容易，因为：其一，《庄子》的所有文章中，都没有足以表明某篇为庄子所作的明显标志，甚至也没有暗示，即使是被传统观点公认是庄子手订的《内篇》也是如此。实际情况

是，在庄子那个时代，不仅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有什么“知识产权法”，甚至也没有著作权的观念和意识，就是自己写的文章也是不署名的，更何况文章在流传过程中，读者可以作合乎自己思想的增删或改动。其二，后人在整理编辑先秦古籍时，往往把编者认为是一派的思想或风格相似或相近的文章收集在一起，而以这一学派的创始人的名字来命书名，以示尊崇师道之意，这样就形成了“凡称子书，多非自著”（章学诚语，见《文史通义·公言》。孙星衍亦有此见，见《晏子序》）的特点。所以，要判定《庄子》中某篇为庄子本人所作是困难的。那么，这是不是说前人的辨伪工作就是徒劳无益的呢？当然不是。如果不拘泥于今天所说著作权的狭隘范围去评价古人的辨伪工作，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努力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其学术价值是不容否定的。那就是：这些考证正确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从思想倾向、内容深浅、文体风格、名物制度、语言特点等诸多方面看，《庄子》33篇之间，甚至有些篇中各章节之间，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别，这些差别说明《庄子》不仅不是一人之作，而且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的手笔，它应该是不同时代、不同观点的人们学术著作的汇集。因此，《庄子》一书就不仅对研究庄子本人思想或庄子学派思想，而且对研究整部《庄子》所反映的一个较长时代的社会思想以及其时各派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社会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回顾庄学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和启发下，后世学者才能沿着探讨学派特色的方向把庄学研究向前推进，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果。

清代以后，关于《庄子》的考辨，基本上是朝着下面两个方面发展。其一，认为《庄子》一书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各派道家文章的总集，考辨的重点放在《外》、《杂》篇的学派分野问题上，罗根泽和张恒寿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罗根泽在《〈庄子〉外、杂篇探源》（见《诸子考索》）中，将《外》、《杂》26篇分作12组，对每一组文章的产生时代和思想派别都有具体考论。其结论是：一、《骈拇》、《马蹄》、《胠篋》、《在宥》为战国末年“左派”道家所作；二、《天地》、《天道》、《天运》为汉初“右派”道家所作（罗氏所谓的“左”、“右”，是以待孔子与儒家的态度来区别的）；三、《刻意》、《缮性》为秦汉神仙家所作；四、《秋水》、《达生》、《山木》、《田子方》、《寓言》为庄子派所作，或说是庄子弟子或后学所作；五、《至乐》、《知北游》、《庚桑楚》为战国末年老子派所作；六、

《徐无鬼》、《列御寇》为战国后期人编的道家言论和道家故事的杂汇；七、《外物》为西汉道家所作；八、《则阳》为战国末年老庄混合派所作；九、《让王》、《渔父》为汉初道家隐逸派所作；十、《盗跖》为战国末年道家所作；十一、《说剑》为战国末年纵横家所作；十二、《天下》为庄子所作。罗根泽对《庄子》的考论，在上世纪30年代前期问世，当时确为别开生面之作，使人耳目一新，影响颇大。正如今人崔大华所评论的：“对宋代以来关于《庄子》外、杂篇的纷纷不一的怀疑和议论，罗氏能给予确定性的解释或理解，这无疑是庄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进步。”（崔大华《庄学研究》第74页）沿着这个研究方向又取得新的成果的，以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张恒寿的《庄子新探》最为突出。张恒寿突破了《内篇》为庄子自著的传统观点，打破《内》、《外》、《杂》的界限，对《庄子》全书进行考论，从而确定各篇、乃至一篇中的各章的写作时代的先后和学派的归属，“比较清晰地显示了在内、外、杂篇之分和篇目之名的帷幕遮掩下的庄子思想本来面目和发展演变过程，是庄学研究的新进展。”（崔大华《庄学研究》第80页）张氏的考论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现将其结论概括介绍如下：《内篇》7篇除《人间世》前三章和其他篇中一些属杂章节外，基本上都是庄子的早期作品；其中《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除鼻杂部分）为庄子的典型作品。《外篇》15篇中，《骈拇》、《马蹄》、《胠箢》3篇和《在宥》篇的第一、二章，为秦统一前夕道家“左派”作品；《天地》、《天道》、《天运》、《刻意》、《缮性》诸篇颇为驳杂，多是秦、汉间道家派、黄老派、养生派、神仙派的思想杂烩；《秋水》以下6篇为庄子嫡派或后学作品，其中《达生》有早出的证据。《杂篇》11篇中，《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列御寇》6篇基本是先秦时作，其中《列御寇》近于杂俎，《外物》无甚精意，其余4篇堪称全书精品，多能发《内篇》未发之旨；《让王》、《盗跖》、《说剑》、《渔父》为伪作，但除《说剑》外，其余3篇与道家思想有联系；《天下》篇是荀子以后司马谈以前介乎儒道之间的学者所作。不难看出，上述罗、张两家的考论尽管结论不同，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两家都承认的，即《庄子》一书非一人一时之作。既然时代有先有后，自然就有个学术源流问题。由于这些认为《庄子》是道家学派总集的学者，在考论时对《庄子》中后出作品的学术分派过于烦细，有些分类的标准与界限也不甚明确，因而在说明它们的学术渊源特别是它们与庄子思想的关系时就不够清晰。这

个缺憾在主张《庄子》一书为庄子学派总集的学者们那里得到了纠补。

其二，认为《庄子》一书是庄子学派的文章总集。考辨的重点放在《外》、《杂》篇与《内篇》的源流关系问题上。这一派在对《庄子》一书总的看法上又回到或接近传统的观点，即《庄子》是庄子及其后学所著，其中《内篇》基本是庄子所作，或者基本上反映了庄子的思想，是庄子学派的早期作品；《外》、《杂》篇则是庄子后学或崇庄者所作，成文时间有先有后，最晚的文章也不会在汉初以后。前者自然是源，是庄子学派思想的中心；后学自然是流，是庄子思想的继续与发展、演变。为了具体揭示这种源流关系，他们还对《外》、《杂》篇文章同《内篇》文章作了对应研究，这在清初王夫之的《庄子解》中已开其端倪。如他说《外篇》中的《天地》篇是“畅言无为之旨，有与《应帝王》相发明者”（卷一二）；《刻意》篇“亦《养生主》、《大宗师》绪余之论”（卷一五）；《缮性》“与《刻意》之旨略同”（卷一六）；《秋水》篇是“因《逍遥游》、《齐物论》而衍之”（卷一七）；《达生》“于内篇《养生主》、《大宗师》之说，独得其要”（卷一九）；《山木》是“引《人间世》之旨，而杂引以明之”（卷二〇）；《田子方》“其要则《齐物论》‘昭之以天’者是也”（卷二一）。这就明确指出了《外篇》文章是在哪个方面继承了庄子思想，或发挥了庄子的哪个观点，其渊流线索自然清晰明白。沿着这个方向研究庄子而取得新成就的，可举出清代学者周金然为代表。周金然在《南华经传释》中把《庄子》的《外》《杂》篇分为7类，一一与《内》7篇对应，说明它们之间的渊流关系。关于周氏有关庄子文章的对应的具体情况我们依据郎擎霄《庄子学案》的引述列表如下：

《内篇》	《外》、《杂》篇
《逍遥游》第一	《秋水》、《马蹄》、《山木》
《齐物论》第二	《徐无鬼》、《则阳》、《外物》
《养生主》第三	《刻意》、《缮性》、《至乐》、《达生》、《让王》
《人间世》第四	《庚桑楚》、《渔父》
《德充符》第五	《骈拇》、《列御寇》
《大宗师》第六	《田子方》、《盗跖》、《天道》、《天运》、《知北游》
《应帝王》第七	《胠篋》、《说剑》、《在宥》、《天地》

表中左边为《内篇》篇名，是《庄子》中的早期作品，是源；右边是《外》、《杂》中篇名，是庄子后学所作，是解释和发挥其对应的《内篇》

文章之旨的，自然是流。此表中缺《寓言》和《天下》两篇，因为周金然把这两篇均看做是庄子的自序。今人崔大华亦认为《庄子》是庄子学派的著述汇集，并作了详细考论。其考论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是以《庄子》各篇中对庄子生平言行的记述、《庄子·天下》篇对庄子思想的概述、荀子对庄子思想的评述三项为根据，来检验《内篇》各篇的中心思想或命题，从而判定《庄子·内篇》“所反映的思想特别是人生哲学思想，是庄子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庄子本人的思想，是庄学之源”（《庄学研究》第89页）。第二步是在此前提下，再将《庄子·外·杂》篇中各篇的思想与《内篇》比照，证明《外》、《杂》中除《说剑》外所有文章的思想、命题、概念、术语，都源自《内篇》，最后又援引刘笑敢近年提出的《内篇》早于《外》、《杂》篇的新证，作为补充论据（刘笑敢根据汉语词汇的发展规律是先有单音词，后有复合词的规律，对《内》、《外》、《杂》篇作了比较研究，指出《内篇》中只有“道”、“德”、“性”、“命”、“精”、“神”等词，而没有“道德”、“性命”、“精神”等词，而在《外》、《杂》篇中后者却多次出现；同时指出“道德”、“性命”、“精神”这些复合词，在早出的《论语》、《孟子》中也没有，而在晚出的《荀子》、《韩非子》中却都能找到，从而证明了《庄子》中的《内篇》早于《外》、《杂》篇，这确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内篇》是《外》《杂》篇思想之源，后者是流）。至于《说剑》一文，虽然思想观念上没有同《内篇》直接发生关系，但可在《外篇》中的《田子方》、《达生》中找到相应的词句，由此可以推断，《说剑》可能是更晚的庄子后学所作。《天下》篇在《庄子》中地位特殊，它是一篇概述先秦思想史的精美文章，它在思想观念上不仅与《内篇》有关联、犀通之处，而且与《外》《杂》篇在主要的、具有特征性的概念、术语的使用上，也是相通的或一致的；另外还能从语词发展上找到晚于《外》《杂》的证据（从“方”、“术”到“方术”，从“道”到“道术”，从“静而圣，动而王”到“内圣外王”等），因而它也应该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其写作时间可能在《庄子》诸篇之后。

前已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初任继愈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认为《内篇》是汉初庄子后学的作品，不代表庄子的思想；而《外》、《杂》才是庄子本人所作，或者说是最能代表庄子思想的作品。任先生的观点虽然新异，但不为学术界多数人所接受，这里仅略作介绍，不再一一辨析。

关于《庄子》其书的研究，目前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多数学者的共识：